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于志光 著

**SPATIAL
ESTABLISHMENT OF
WUHAN URBAN SETTLEMENT**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赵冰 主编

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于志光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于志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ISBN 978-7-112-12188-5

I. ①武… II. ①于… III. ①城市空间-研究-武汉市
IV. ①TU984.2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6005号

责任编辑: 徐 冉 陆新之 焦 扬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关 健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赵冰 主编

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于志光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22¹/₂ 插页: 2 字数: 552 千字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6.00** 元

ISBN 978-7-112-12188-5

(1945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总序^①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是我主持并推动的一项研究。

首先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进行个案研究。城市规划对城市的研究目前多是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同时段的笼统研究而未针对具体个案展开全面的解析深究。但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城市规划的现实困境已促使我们必须走向深入的个案研究,若继续停留在笼统阶段,不针对具体的个案展开深入的解析,不对个案城市发展机制加以深究,将会使我们的城市规划流于一般的浮泛套路,从而脱离城市自身真切的发展实际,沦为纸面上运行的规划,为规划建设管理带来严重的困扰。因此我们急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急需更进一步全面展开个案的研究,只有在个案的深入研究及对其内在独特的发展机制的把握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城市规划的具体个案实践中给出更加准确的判定。

当然也并不是说目前没有个别的城市规划个案研究,比如像北京等城市的研究还是有的。但毕竟如北京,是作为首都来进行研究的,其本身就非常独特,跟一般性的城市不同,并不具有个案研究的指标意义。况且这类的研究大多未脱离城市史研究的范畴,而非从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来展开的空间营造的研究。

早在1980年代我就倡导以空间营造为核心理念来推动城市及城市规划的研究。在我看来,空间营造是城市规划的核心理念,也是城市规划基础性研究即城市研究的主线。

我是基于东西方营造与“Architecture”的结合提出空间营造理念的。东方传统注重营造,而西方传统注重“Architecture”。营造显示时间序列,强调融入大化流衍的意动生成。“Architecture”则指称空间架构,强调体现宇宙秩序的组织体系。东方传统从意动生成出发,在营造过程中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面对不同的局势、不同的场域,充满着不断的选择以达成适宜的结果;在不同权利的诸多生活空间的合乎情态的博弈中随时进行不同可能序列的意向导引和选择,以期最终达成多方博弈的和合意境。西方传统的目标是形成体现宇宙秩序的空间组织体系,这一空间组织体系使不同权利的诸多生存空间的博弈能合乎理性地展开。而我提出空间营造就是将东西方两方面加以贯通,我认为空间营造根本上是以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空间博弈为目标的意动叠痕。

对于城市空间营造来说,何为最大的空间博弈?我以为应该是特定族群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生存空间意志和生存环境的互动博弈。当特定族群的人们有意愿去实现梦想中的城市空间时,他们会面对环境的力量来和它们互动博弈,这是城市空间营造中最大的一个互动博弈,人们要么放弃,要么坚持,放弃就要远走异地,坚持就要立足于这个特定的环境,不断去营造适宜的生存及生活空间。这是发生在自然层面的博弈。而在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为了各自的理想空间的实现也在一定的体制内进行着博弈,这其中离不开各种机构和组织的制衡。在个人层面,不同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意欲也会作为潜在冲动的力量影响其自

^① 本文发表于《华中建筑》2010年第12期。

主的选择。城市规划就是贯通这三个层次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给出的一次或多次城市空间营造的选择,其目的是以自主协同的方式促使空间博弈达成和合各方情理的一种平衡。

我提出的自主协同是至关重要的,在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个体的权利都希望最大化,这是自主性的体现,但这需要博弈规则对此加以确保,博弈规则的确立就需要协同,协同是个体为确保自身权利最大化而自愿的一种行为。协同导致和合情理的博弈规则的遵从,这也是城市规划的目的。

和合各方情理就是促使博弈中诸多情态和诸多理念达成和合。这里也包含了我对城市规划的另一个看法:即城市规划应试图在空间博弈中达成阶段性的平衡。假如没有其他不期然的外力作用的话,它就达到并延续这种平衡。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不期然的外力,空间博弈就会出现不平衡。规划就需要再次梳理可能的新关系以达成空间博弈的更新的平衡。

多年来的研究与实践使我深感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的迫切性,更感到城市规划变革的必要性。在我历年指导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中目前已陆续进行了30多个个案城市的空间营造的研究,这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我希望从我做起,推动这项工作。

所有的这些个案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的对象统一界定并集中在城市本身的空间营造上。时段划分上,出于我对全球历史所做的深入思考,也为了便于今后的比较研究,统一按一维神话(中国战国以前)、二维宗教(中国宋代以前)、三维科学(中国清末以前)三个阶段作为近代以前的阶段划分,1859年以后近代开始,经1889年到1919年,1919年现代开始,经1949年到1979年进入当代,经2009年到未来2039年。这是近代、现代、当代的阶段划分,从过去指向未来。

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城市个案,就要研究它从诞生起开始,随着时间的展开,其空间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时空是如何转换的,其空间博弈中所出现的意动叠痕营造是如何展开的,最终我们要深入到其空间博弈的核心机制的探究上,最好能找出其发展的时空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个案城市2009年以后空间的发展给出预测,从而为进一步的规划提供依据。

空间方面切入个案城市的分析主要是从城市空间曾经的意动出发对随之形态化的体、面、线、点的空间构建及其叠痕转换加以梳理。形态化的体指城市空间形态整体,它是由面构成的;面指城市中的各种区域空间形态,面又是由线来分割形成的;线指城市交通道路、视线通廊、绿化带、山脉、江河等线状空间形态,线的转折是由点强化的;城市有一些标志物、广场,都属于点状形态,当我们说空间形态的体、面、线、点的时候,点是最基本的,点也是城市空间形态最集中的形态。这就是我们对于个案城市从空间角度切入所应做的工作。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从空间形态的叠痕中,体会个案城市的风貌意蕴,感悟个案城市的精神气质。

时间方面切入个案城市的分析包含了从它的兴起,到兴盛,甚至说有些城市的终结,不过目前我们研究的城市尚未涉及已终结或曾终结的城市。总体来说,城市是呈加速发展的。早期的城市,相对来讲,发展较为缓慢,在我们研究的个案城市中,可能最早的是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出现,处于一维神话阶段,神话思维引导了城市营造,后世的都市守护神的意念产生于此一阶段。战国至五代十国是二维宗教阶段,目前大量的历史城市出现在这个阶段,宗教思维引导了此阶段城市营造,如佛教对城市意象的影响。从宋代一直到清末,是三维

科学阶段，科学思维引导了此阶段城市营造，如园林对城市意境的影响。三个阶段的发展时段越来越短暂，第一阶段在战国以前是很漫长的一个阶段，从战国到五代十国，这又经历了将近一千五百年。从宋到清末年，也经历了九百年的历程。

1859年以后更出现了加速的情况。中国近代列强入侵，口岸被迫开放，租界大量出现，洋务运动兴起。经1889年自强内敛到1919年六十年一个周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完成发展的一个循环。从1919年五四运动思想引进经1949年内聚，到1979年，我们又可以看到现代六十年发展的循环。1919到1949三十年，1949到1979三十年。从1979年改革开放兴起，经2009年转折到未来2039年又三十年，是当代六十年发展的循环。从发展层面上来说现当代一百二十年可以说是中华全球化的一百二十年。它本身的发展既有开放与内收交替的历史循环，也有一种层面的提高。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在讲，1919年真正从文化层面上开启了中华全球化的进程，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国现代人的全球化的意识，有了一种重新看待我们所处的东方文化的新的全球角度。通过东方的和侵入的西方的比较来获得一种全新的文化观。1919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时代的到来，中国进入到一个在文化基础上进行政治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持续到1979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以政治革命来主导中华全球化的进程。这个阶段是建立在上一个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所开展的一个政治革命的阶段。这种政治革命是有相应文化依据的，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上的全球视角，所以它就在这个视角上去推动一个全球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运动，希望无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导阶级，成为全球革命的主体，以这个主体来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这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一种政治革命。这种政治革命到1979年宣告结束。1979年以后，随着邓小平推动的以经济为主的变革，中华全球化就从政治革命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经济改革的时代。这个改革的时代一直持续到2009年，可以说中华全球化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不仅仅在文化，在政治，也在经济这三个层面获得了中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当然2009年到随之而来的2039年，中国将会更深入的在以前的三个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主，公民社会的建构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呼声。未来我们会以这个为主题去推进中华全球化，推进包括空间营造在内城市规划的发展。

实际上在空间营造方面我们也经历了与文化、政治、经济相应的过程。在特定的阶段都有特定的空间营造的特点。我希望在对个案城市的研究中，特别应该注意现当代空间的研究。结合文化、政治、经济的重点来展开具体的分析。比如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中，当时的城市空间营造推进了一种源于西方的逻辑空间意识，这种逻辑空间意识当然是以东西方结合为前提的，与之呼应出现了一种复兴东方的传统风格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中，城市的风貌表现出的一种相互间的整合，总体上是文化意识层面的现代城市空间的营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南京的规划，就是以理性空间结构与传统的南京历史格局相结合。第二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是主导，所以在空间引导方面更多的是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空间的营造。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空间意识，比如说北京城市的空间营造，特别能够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空间的权力，人民的权力空间。所以包括天安门广场，以及整个围绕天安门广场的空间的布局，它反映出的一种现代中国人民的权

力意识的高涨。面对着南北轴线上的紫禁城，如何去和它相对抗，出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竖立在南北轴线上，正面对者紫禁城的空间，表现出人民的一种强大的权力。当然人民权力的领导者毛泽东的纪念堂最终也在 1978 年落到了南北轴线上，更是最终定格了人民的权力。这是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空间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一种象征性，北京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关于人民政治权力的表现，在空间上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当时的各个城市也同样建立了人民广场，同时工人新村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空间类型。单位的工作、生活前后空间组织的格局成为最基本的空间单元。1979 年至 2009 年，这三十年在空间上更多的是关于空间利益的。不同的空间代表不同的利益取向。从开发区的划定，到房地产楼盘的泛滥，城市空间的营造离不开空间的利益，离不开不同的个体或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在城市建设中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 2009 年以后未来三十年将会如何？这就涉及对未来发展的宏观认识以及未来城市规划应该把重点放在何处的的问题。它涉及未来我们以怎样的思想和方法来进行规划，涉及城市规划自身的变革问题，涉及规划师自身的转型问题。我提出用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规划理念和方法来开展个案城市今后的规划，这当然是基于空间营造是以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空间博弈为目标的意动叠痕思想而对个案城市的一种把握。我希望能够整合现当代所获得的空间之理、空间之力、空间之利来达成未来的空间之立，个体的空间自立是阶段性空间博弈平衡的目标。这里的核心是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主性，同时防止让他们侵害到其他的自主性，使得我们的规划能够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公民社会的建构。

我们研究这些个案城市，就是为了顺着族群生存空间的梦想及其营造实现这一贯穿始终的主线，梳理个案城市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空间营造所面对的一次次来自自然、社会、个人的挑战及人们所作出的回应，把握它独特的互动机制，从而进一步推动它在未来的空间营造特别是公民社会的空间建构中来具体实现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空间博弈。这就是我希祈每一个个案研究所要达成的目的。

在体例上，所有这些论文也都是以这样的基本格局来展开的。我希望我指导的硕士生、特别是博士生能够脚踏实地，像考古学家一样调研发掘他所研究的个案城市的营造叠痕，也要深入钻研，像历史学家一样详尽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且发挥规划师研究和体悟空间的特长以直观且精准的图文方式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图的绘制，这本身就是研究的深化。我当然也知道他们的个性及求学背景的差异会最终影响论文的面貌，只能尽力而为了。

最后，我表达一种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研究计划中来，以便尽早完成中国 600 多个个案城市的研究，同时推动城市规划的变革。

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首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冰

2009 年 7 月于武汉

序 一

城市是人类聚集而成的最大“活体”。它的空间营造，不似蜂巢之纯任动物本能，建得全然合乎几何原理，但也并非绝无规律可循。历代学人，为了探寻这种规律，可谓“费尽移山心力”。近年武汉大学建规学院赵冰博士更发宏愿，鼓励他的弟子群写成“城市聚落空间营造研究”的系列论文，各以长江流域中游某个城市作为个案研究，这就使得这些论文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便于比较。笔者曾参与一些论文的评议，从中受益。欣悉于志光君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央我作序，给我一个抒发见解的机会，我乐于应命。

据赵冰博士近日发表的《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总序》称：“博士论文中目前已陆续进行了30多个个案城市的空间营造的研究”。我谬承宠邀，参加了多次他所主持的个案论文的评议，除读出各“个案”的“个性”之外，也渐渐读出一些“共性”，最重要的共性就是作者对“环境认知”之着重与否和准确与否，很影响论文的质量。若对自然环境或曰地理环境的认知不重视，欠准确，文章就显得底气不足，理据模糊，支吾其辞，难于取信。若能在环境认知方面有一得之见，文章就能侃侃而谈，理直气壮。不仅能解释历史，描绘现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研究生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的对象就是环境之优化，如果根本不理会环境之历史和现状，侈谈“空间营造”，岂非离题万里？

像地理决定历史，环境决定人文，如此简单直接的唯物主义常识，为何竟被不少同学轻忽呢？这不能不牵涉我们多年来的历史教育——教的号称“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不尽然。像源出希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世纪本颇得宏扬，到1938年就被社会主义革命领袖所否定。他的论法是：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并无多大变化，却从原始公社制越过奴隶占有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见地理环境决定论不能成立云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论题的概念被偷换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本非“地理环境变化决定论”。经过这一偷换，地理环境决定论就变得荒唐，一部社会进化史就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学者们的科学思维被打乱，学生们也就无所适从。对于影响、制约城市空间营造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地理环境等闲视之，置于众多因素之中甚至全然轻忽，讨论下来，就不着边际，叫评议者无从知晓他们论点的要领何在。

幸运的是，于志光博士对地理环境之认知下过真功夫。他认识到，他研究的个案——武汉，历史上曾经是湖广盆地沼泽东岸的一个大岛，这与鄙见不谋而合。他更在他的文章中讨论“古夏口的千古之谜”，发见人文地理学大师石泉先生判断“古夏口在今之钟祥”与鄙见也是不谋而合，这令笔者惊喜。我曾参加石泉先生主持的“楚文化学会”，有过几次交谈，但不曾谈到古夏口问题。如果谈到了，我一定对他的结论投赞成票。我知石泉先生博极群书，他的考证都有坚实的文献基础，我无法与他较量。我用的其实是简单的绘图办法，我只要用海拔50米的等高线画出古湖广盆地的“水涯线”，就立刻发现以大洪山区为中心的钟祥—随州一圈也是一个大岛，古汉水是从随州经过，沿今沮水流入云梦大泽的。今汉水乃是古

汉水的一条季节性支流——“夏水”，到夏季，汉水大盛，随州古汉水宣泄不及，溢流到古汉水之“夏水”，必然从今钟祥流入云梦大泽。这“夏水”入泽之“口”当然就是“夏口”。今汉水在这一带最大洪峰水量达 40000 秒公方，古夏口也必然十分壮观。这里曾经建过春秋楚国都城——郢都，绝对当之无愧：这里“王气”十足！其他争议中的春秋楚都地址，都无法与钟祥相比。

上文谈论的古夏口是“汉夏”，不是“江夏”。长江另有“江夏”。今长江之南，西起陆口，东到黄冈一带，有众多湖泊和河道，是江夏遗迹。最明显的一段古长江“夏水”故道在今土地堂和山坡之间通过，人们在这里运用“视觉成象能力”（Visualization）不难“想见”这段古长江的浩瀚之象。这段古长江之被堵塞是很晚近的事。清末胡林翼在鄂主政之日就建成下游樊口闸坝，到“民国廿四年”（1935）建成上游金口闸坝，学者还不难找到更多的上下游被闸断的江夏出入口遗迹。最后只剩下一个“龟蛇锁大江”的总出口——今龟山北汉水本来也是一条“夏水”，古汉水主流曾从龟山南流过。

近代历史的迅速变迁把汉北的“汉夏”和江南的“江夏”都湮塞了，像我这出生于 1923 年的小老头几乎是全过程的见证者。在我 4 岁多点（1927），先父把我牵到江边，我看见体积庞大的“盐船”在汉口江边卸货，那时江边并没有堤。我家于 1929 年迁居宜昌，1931 年的洪水淹没了大半个汉口，1934 年寒舍返回武汉，在轮船靠岸时看见江汉关以下建起了堤防，不过高度只一米多点，所以江滩景观还很整饬。经过 1954 年的 29.73 米洪水，汉口江堤升高了五六米。若非洪水季节，在江面轮船上根本就看不见江滩建筑的底层，武昌汉阳也都同此命运。武汉的“面貌”在整个江面上几乎失踪。在这种条件下谈论武汉城市空间营造，难乎其为规划师矣！但正是面对这种现状，博士们该为规划师助力一臂。博士们该在导师的指导之下，认知现状，追根求源，洞鉴未来，为规划师们出谋献策。

我们现在不难认知，“武汉岛”周边的天然界限很清楚：它的北缘在古“汉夏”，南缘在古“江夏”，西缘在金口、大军山、侏儒山、龙霓山一线，东缘在鄂城西山和黄冈一线。由于江夏汉夏堵塞欠通，只剩“龟蛇锁大江”，结果落得水涨堤高、堤高水涨的恶性循环。人们不难理解，武汉岛周边大泽是有源之水，人们与水争地，大泽不甘退缩，年年“卷水重来”，就得劳民伤财，几十万人上堤防汛。基于此等认知，为武汉城市空间筹策营造的人就该设想，采取某种措施，与地理环境成立双赢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古汉夏、古江夏的功能，若能分流武汉最大洪峰流量 60000 秒公方的一半，让龟蛇之间只通过 30000 秒公方的流量，让武汉最高水位降到 26 米左右，岂不大家平安无事？武汉的面貌就会在江汉之滨全面“亮相”，尽现天工人力相得益彰之美！

不能小看中国古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能力。他们在战国时期认出九洲，且能为九洲大泽排出干涸顺序而著为《禹贡》一书，他们之中的楚国先君就不难认出钟祥古“汉夏之口”的气势而选定“郢都”“位置”，三国孙权更不难在武汉古“江夏之口”认出鄂城形胜而定为吴国第一都城。这两处都有王都乃至皇都气象，都被中国人认知，而且真个定为都城。这不是偶然现象，中国人还总结出一些规律而发展成为几乎中国独有的学问——勘舆之学，比西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更早、更系统化。我们不必因这门学问欠完善又遭贬谪而永远讳言其事，乃至在理论研究中采取回避态度，用一些“生存空间需求”或“生存空间意志”

来取而代之，作为城市空间营造的“决定因素”。我想这些因素也存在，但属一种“模糊存在”，很难为之下准确定义，真个付诸实践，就缺乏“可操作性”。广被称引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一段似乎可以作为这些“生存空间需求”或“生存空间意志”的成文例证，但也决非来自先天，而是在原始的小规模实践中形成共识逐渐转化成为“需求”或“意志”。一到大规模实践，就不能不服膺更为宏观的《管子》学说。此类例证，在赵冰博士指导下的系列个案论文中比比皆是。一经切磋琢磨，早该得出共识：城市空间营造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对地理环境的正确认知。

尽人皆知城市空间营造是经纬万端的系统工程，单单拈出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未必不是偏颇。但，请注意“最重要”三字，并无否定或轻忽其他因素之意。《管子》所提立都条件须“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因天材，尽地利”，理论上已经不会有两处选址雷同，再加上其他因素，更该使城市空间千变万化。但我国当代城市竟貽“千城一面”之讥，这不容我们不反思：是否首先对地理环境的认知不到位？是否规划家们有意无意把一些臆造的“心灵图式”强加于城市以致城市失去特色？

于志光博士的论文洋洋 40 万言，对资料文献可谓穷搜极讨，巨细无遗，足够他取精用宏。他着重地理环境之认知，出于他的独立思考。这并不妨碍赵冰博士指导下的众多博士弟子在他们的个案论文中提出其他着重点。学生们都在探索思考，其实导师也在探索思考。这带动论文的评阅者们不得不参与探索思考，连为本书作序的人也被逼上梁山，无法用一味赞誉之辞来敷衍塞责。大家能在这一小块园地上兴起探索思考之风，倒未必不兆征赵冰博士的宏伟研究计划之旗开得胜。是为序。

张良皋

2010 年 12 月

序 二

于志光先生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同学。他跟我一样，都是1987年进入珞珈山下的美丽校园，又都是不约而同在1988年转入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那一年，武汉大学恢复建筑系后招收了首届城市规划专业学生。那一年，我们一起在武汉这座城市开始了城市规划的学习。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回忆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建筑系的岁月，有很多难以磨灭的东西。最值得怀念的，是那个时候独立的精神和单纯的理想。那个时候，老师们都很年轻，有些甚至自己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系里提出的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口号，要打破传统规划专业的工匠式教育方法，培养真正有思想的规划师，所以在常规课程之外引入了大量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的教育内容。那个时候，我们更加年轻，听过几次讲座，自己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就敢在学校里举办达达主义艺术展览，还把邻校同专业的同学们拉到一起搞专业联展，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沾沾自喜。无知者无畏，大约说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状态。或许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更加锻炼大家敢于尝试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毕业以后，于志光先生先在武汉最大规模的国有房地产公司工作，后又组建了自己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公司，事业发展十分出色。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于志光先生出人意料地回到母校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选择了“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这样一个需要极大工作量的题目。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把经营状况非常红火的公司业务暂时停下来，三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找到了一些过去没有发现的武汉规划建设史料，走访了国内相关专家学者。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凝聚了他潜心钻研的成果，研究思路缜密，基础资料系统，主要的观点是作者通过大量分析和归纳得出的，体现了作者朴实而严谨的学术风格。

武汉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与大多数中国的城市不同，她是由长江两岸的三个历史、文化、功能、风格都迥然不同的小城市整合而来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三镇之间的街道肌理、空间尺度和山水风情的差异。探究武汉如此多样的城市空间营造的内在原因，进而把握其中的规律性，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另一方面，武汉这样的组合城市未来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种普遍的现象。随着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两种作用力的影响，城市发展的概念将不再仅限于单一城市规模的扩张或者职能的调整，更多的将会是相邻城市之间的合作、竞争和融合。由此产生的新型的城市组群，将有着完全不同的外部形态和内在规律性。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将会是21世纪中国城市规划的焦点问题之一。

希望作者和读者们一起把这项历史性的研究持续下去。

武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吴之凌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国内外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发展综述	1
1.1.1 国外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发展	1
1.1.2 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认知范式的转换	10
1.1.3 国内城市空间形态理论研究的进展	12
1.1.4 城市空间营造理论——空间生成的方法论	13
1.2 武汉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5
1.3 研究对象、意义和目的	17
1.3.1 研究对象	17
1.3.2 研究意义	18
1.3.3 研究目的	18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19
1.4.1 研究内容	19
1.4.2 研究方法	20
第 2 章 古代武汉城市空间营造	22
2.1 223 ~ 589 年镇邑空间形态与营造主题：军事镇邑时期	23
2.1.1 历史地理背景	23
2.1.2 地理与政治的双向选择	28
2.1.3 镇邑空间形态特征	30
2.1.4 古夏口的千古之谜	32
2.2 589 ~ 1275 年城市空间形态与营造主题：政治镇邑时期	33
2.2.1 政治边疆向政治中心的变迁	33
2.2.2 镇邑重建及其形态	34
2.2.3 鄂州城时代居住区分布变迁	40
2.2.4 城市改造与更新	42
2.2.5 城市新功能和新建筑形态的诞生	43
2.2.6 城市的商业功能与空间变迁	44
2.2.7 独特的商业空间形态——沙洲模式商业中心和夜市	48
2.2.8 唐宋时期城市空间形态的总体特征	49
2.2.9 早期城市的内在脆弱性	50
2.3 1275 ~ 1859 年城市空间形态与营造主题：城邑文明的鼎盛时期	52
2.3.1 城垣变迁	53
2.3.2 新的皇权结构与城市空间营造	56

2.3.3	城市空间营造：城市守护神与意识形态的教化·····	60
2.3.4	汉口——一个商业化都市形态的形成·····	62
2.3.5	居住建筑形态·····	69
2.3.6	城市公共建筑形态：衙门与会馆·····	72
2.3.7	三镇道路空间形态变迁·····	75
2.3.8	城市空间意识形态的早期压迫·····	82
第3章	1859 ~ 1949 年近代武汉城市空间营造 ·····	85
3.1	营造背景：外部空间形态演变总体回顾·····	85
3.2	1859 ~ 1889 年保守主义与理想城市空间形态·····	87
3.2.1	空间意识形态的对抗——毁灭与新生·····	87
3.2.2	旧秩序的恢复——保守主义与城市重建·····	89
3.2.3	城市理想模式的线索·····	91
3.2.4	圣地与租界选址·····	94
3.2.5	1889 年前的租界区：街区片断·····	95
3.3	1889 ~ 1919 年近代工业和教育的城市空间变革·····	97
3.3.1	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历史背景·····	97
3.3.2	租界区空间对抗与融合——变革力量的势能·····	99
3.3.3	混合用地模式——新城市主义的实证渊源·····	102
3.3.4	铁路引起的扩张：汉口城市的扩张·····	106
3.3.5	跑马场：汉口华界新区空间对抗与融合·····	112
3.3.6	工业布局：传统手工业的城市和近代蒸汽工业城市·····	114
3.3.7	近代学校教育空间的演化与城市布局·····	118
3.3.8	晚清自开口岸的城市布局——向武昌北扩张的计划·····	121
3.3.9	武汉旧城区的城市形态与改造计划·····	122
3.3.10	辛亥革命：重建计划的梦想与失落·····	129
3.4	1919 ~ 1949 民国时期的去地方化与都市理想·····	132
3.4.1	从五四运动到新生活运动的城市理想·····	132
3.4.2	城市封闭结构的终结：城墙的拆毁——象征意义与理性价值·····	133
3.4.3	近代都市空间形态：地方社会向空间社会的转变·····	136
3.4.4	都市拓展与都市居住问题·····	146
3.4.5	理想城市与乌托邦——民国期间的武汉都市形态发展计划·····	152
3.4.6	日据时期——对城市空间的破坏性使用（1938 ~ 1945 年）·····	162
第4章	1949 ~ 1979 年现代武汉城市空间营造 ·····	163
4.1	营造背景：外部空间形态演变总体回顾·····	163
4.2	1949 ~ 1959 年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与营造主题·····	164
4.2.1	分享胜利果实——社会主义改造与城市空间再分配·····	164

4.2.2	现代工业建设与城市空间初步形态·····	166
4.2.3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的工人新村与居住区空间形态·····	171
4.2.4	城市肌理: 居住区重构和嵌入·····	178
4.2.5	1949 年后的里弄集合住宅·····	179
4.2.6	高等教育设施及其空间形态·····	180
4.2.7	前苏联规划思想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181
4.3	1959 ~ 1979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调整与文革时期·····	184
4.3.1	城市人民公社——“协同体”与“去国家化”的线索·····	184
4.3.2	大跃进过后的矫枉过正——“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87
4.3.3	工业发展带动的城市空间演进·····	188
4.3.4	制度性分割的单位空间·····	189
4.4	军事存在与空间营造——被遗忘的城市形式·····	191
第 5 章	1979 ~ 2009 年当代武汉城市空间营造·····	194
5.1	营造背景: 外部空间形态演变总体回顾·····	194
5.2	1979 ~ 1989 年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营造主题·····	196
5.2.1	统一建设、统一规划下的城市居住空间·····	197
5.2.2	三镇城市商业空间演变与商业中心的转移·····	199
5.2.3	街市的复活·····	200
5.3	1989 ~ 1994 年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营造主题·····	201
5.3.1	房地产住宅开发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202
5.3.2	以开发区主题引导城市空间形态的跳跃式增长及其问题·····	205
5.4	1994 ~ 1999 年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营造主题·····	209
5.4.1	强化汉口主城区功能——“退二进三”引发内聚式发展·····	209
5.4.2	空间形态的整合期: “环”空间意象的建构和空间特征·····	211
5.4.3	单位大院制度的解体·····	213
5.4.4	20 世纪 90 年代旧城改造·····	214
5.5	1999 ~ 2004 年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营造主题·····	215
5.5.1	住宅社区形态演变·····	216
5.5.2	城市公共空间形态——一个失策的案例·····	222
5.5.3	郊区化的梦想——郊区城市化的假象·····	223
5.5.4	高校的迅速扩张和未来·····	224
5.5.5	“城中村”——城市“毒瘤”与希望·····	226
5.6	2004 ~ 2008 年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营造主题·····	231
5.6.1	城市空间高层化趋势·····	231
5.6.2	郊区城市化——混乱的城市肌理: 以西北组团为例·····	236
5.6.3	城市景观化: 偏见与误区·····	238
5.6.4	“历史空间的怀旧”——旧城保护与更新·····	239

5.6.5	滨水城市空间的复兴——封闭的“开放空间”	242
5.6.6	离心力与向心力——多中心和单中心	244
5.6.7	工业空间布局的演变	250
5.7	当代城市空间营造意象	251
5.7.1	规划思想	251
5.7.2	规划模式和城市空间发展方向的争论	252
第6章	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规律研究	258
6.1	古代到当代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总结	258
6.1.1	聚合：古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	258
6.1.2	集合：近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	259
6.1.3	组合：现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	260
6.1.4	整合：当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	260
6.2	古代到当代城市空间营造机制的变迁	261
6.2.1	古代传统空间营造机制变迁	262
6.2.2	近代营造机制及其变迁	264
6.2.3	现代营造机制及其变迁	265
6.2.4	当代营造机制	266
6.3	武汉城市空间形态历史演化机制	268
6.3.1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研究现状	268
6.3.2	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机制	270
6.3.3	自然环境制约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	271
6.3.4	社会政治经济制约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	272
6.3.5	文化因素制约的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	276
6.4	武汉城市空间形态总的演化规律	279
6.4.1	城市外部空间历史演化规律总结	279
6.4.2	三镇之间空间营造强度周期性客观转移的历时性比较分析	282
6.4.3	城市内部空间形态演化规律总结	285
6.4.4	空间形态演化的周期性规律	286
6.5	结论	292
第7章	新时代背景下武汉城市空间营造对策与展望	295
7.1	全球化、和谐城市与公民城市	295
7.1.1	全球化城市	295
7.1.2	和谐城市	297
7.1.3	公民城市	298
7.2	城市化时代的挑战——现象宿命与历史逻辑的失踪	301
7.3	今后理论与实践探索重点关注的方向	303

7.3.1 “公共领域”——和谐城市空间营造的核心思想	303
7.3.2 和谐城市空间形态类型选择——生态单元思想及其他	304
7.3.3 和谐城市空间营造价值观——人文关怀与空间道德重建	306
7.3.4 城市治理的过程合理性——和谐城市空间形态营造机制	309
7.4 武汉城市空间发展预测	313
7.4.1 城市外部空间发展方向预测	313
7.4.2 城市内部空间发展方向试析	316
附表	318
参考文献	331
后记	342

第1章 绪论

1.1 国内外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发展综述

1.1.1 国外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发展

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理论研究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成果甚丰，本书只作扼要的历时性回顾，侧重于理论发展过程中关键事件及其影响的描述和总结。

1. 工业文明前期

公元前1500年，商朝盘龙城（武汉近郊）遗址一号宫殿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前朝后寝”式建筑布局实例（图1-1）。

公元前1100年，我国在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开国之初就有了满足等级制度需要的城市形态的规划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制度代表了正统的体现王权意志的营城观念和理论（图1-2）。

几乎同一时期，《管子》一书对城市布局提出了与《周礼·考工记》截然不同的灵活性、因地制宜、遵从自然的观点。《管子》中的“乘马”曰：“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凡立国都，非于广川之上，必于大山之下，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

公元前450年，古希腊的重要贸易城市米利都（Milelus）出于“商业的殖民地系统需要^①”发展了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棋盘状方格网都市形式（图1-3）。按照詹姆斯·E·万斯的说法，这一形式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城市发展中以“规律性”保持“整体性”的概念。

与此同时，希腊城市发展了最初的神居的“广场”（Agora）^②（图1-4）。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的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了有利于城市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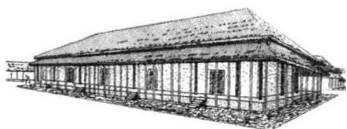


图 1-1 盘龙城遗址复原想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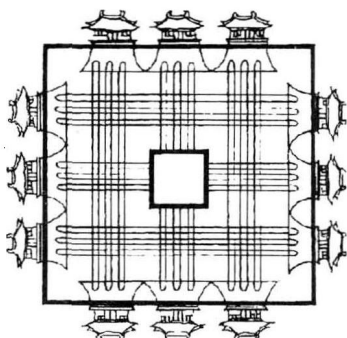


图 1-2 周礼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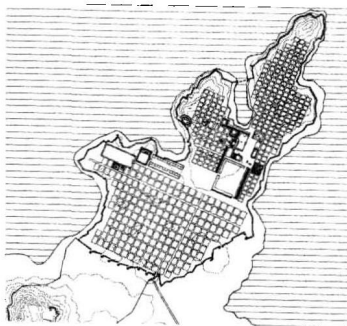


图 1-3 米利都城

① [美] 詹姆斯·E·万斯. 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 凌霓, 潘荣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44.

② 同①: 50.